

●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

蔡和森评传

徐方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34981

K827
2094

●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

蔡和森评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827
209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和森评传 / 徐方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3503 - 7

I. ①蔡… II. ①徐… III. ①蔡和森(1895 ~ 1931) — 评传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16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5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本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指导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继承者在解决不同时代课题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在指导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和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风雨历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并且在继续影响 21 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发展。

自 2005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以来，已经有了较好、较快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开放性所决定，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所决定，更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任务所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过程中，湖北大学几代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在 2013 年 1 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取得了前三分之一的好成绩。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学院的广大教师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中，近三年有两部学术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现在编辑出版的《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就是其中部分的研究成果。

2013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回顾 20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辉煌与坎坷，正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深感习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发人深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十分必要；深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深感坚持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坚持学科发展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统一，应该成为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这里仅就政治性与学术性的辩证关系略作分析。

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当辩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摇摆于两者之间，而没有很好地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科研实践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政治与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括着各种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不同，它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形式，以及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念现象。既然它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那么，在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它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其总体和本质而言，它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对立，自然也就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现实存在的利益矛盾，必然会产生思想的、政治的分野。这是客观的存在。所以，不能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问题完全同政治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完全混同起来。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层次性，有的同政治的联系比较直接，有的则比较间接。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一经产生便获得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活动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与制约，但决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更不能用一种去代替另一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思想界的主要偏差在于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夸大政治而贬低学术，用政治冲击学术，模糊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甚至把学术是非当作了敌我问题，用政治大批判代替了学术批评。思想界存在的这种“左”的思潮，影响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扭转了这种局面，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春天。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变化。但是，也要防止出现忽视政治、使学术研究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作为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武器的情况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能使我们自己解除精神武装。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坚守失败，教训十分深刻！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理论观点，如“告别革命”、“政治多元化”和宣传“私有化”等理论观点，都披着学术的外衣在极力扩散。当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几种社会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哪一种不带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呢？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危害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产生不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但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与学术问题，吸取 60 多年来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经验和教训，防止“左”的或右的偏向，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世纪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衷心地希望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们能够辩证地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资政育人，努力提升学术影响力，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的出版，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发生积极的影响！

靳辉明

2013 年 11 月 18 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动荡的青少年(1895.3—1913.2)	(4)
一 诞生在上海	(4)
二 寄居于外祖母家	(8)
三 辣酱店学徒	(11)
四 16 岁的“太学生”	(14)
第二章 长沙求学(1913.3—1917.6)	(17)
一 没有文凭的考生	(17)
二 三代人赴长沙求学	(20)
三 杨昌济的得意弟子	(22)
四 “湘江三友”志同道合	(28)
五 《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30)
第三章 共建新民学会(1917.6—1918.6)	(34)
一 困居岳麓山下	(34)
二 朴素的历史观	(37)
三 共建新民学会	(39)
四 读“无字之书”	(45)
五 试验“新村”生活	(47)
第四章 走出湖南(1918.7—1920.1)	(49)
一 第一次赴北京	(49)
二 筹组赴法勤工俭学	(52)
三 布里村的学生和先生	(54)

四 投身五四运动	(57)
五 珍贵的信件	(59)
第五章 走向世界 (1920.1—1921.11)	(64)
一 两代人赴法	(64)
二 “向蔡同盟”红色知己	(66)
三 蔡和森的建党思想	(71)
四 蔡和森的建党活动	(79)
五 学生运动的领袖	(82)
第六章 入党中央 (1920.12—1923.5)	(87)
一 理论战线崭露头角	(87)
二 出席中共“二大”	(91)
三 首任《向导》主编	(93)
四 蔡和森的反帝爱国思想	(98)
五 蔡和森的反封建思想	(104)
六 上海大学教授	(108)
七 蔡和森的哲学思想	(110)
第七章 促进国共合作 (1923.6—1925.6)	(120)
一 力主党外合作	(120)
二 出席中共“三大”	(123)
三 在“三户楼”办公	(129)
四 蔡和森的统一战线思想	(132)
五 评说商团事变	(140)
六 投身非基督教运动	(156)
第八章 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1925.1—1925.6)	(162)
一 参加党的“四大”	(162)
二 反对孙中山北上	(163)
三 悼念孙中山	(168)
四 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172)

第九章 首赴莫斯科 (1925. 10—1927. 3)	(179)
一 离任《向导》主编	(179)
二 向蔡婚变	(188)
三 与共产国际抗争	(193)
四 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198)
五 作第一部党史报告	(203)
第十章 战斗在武汉 (1927. 4—1927. 8)	(212)
一 参加中共“五大”	(212)
二 提出创建两湖革命根据地	(218)
三 参加八七会议	(222)
第十一章 指导北方局工作 (1927. 9—1928. 2)	(227)
一 顺直省委改组风波	(227)
二 作《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	(234)
第十二章 再赴莫斯科 (1928. 3—1928. 12)	(239)
一 出席中共“六大”	(239)
二 蔡和森事件	(244)
三 投身思想理论论战	(249)
第十三章 最后的岁月 (1929. 1—1931. 8)	(255)
一 发表《论陈独秀主义》	(255)
二 反对“立三路线”	(264)
三 英勇就义	(268)
主要参考文献	(272)
蔡和森研究主要论著目录索引	(275)
后记	(283)

绪 论

蔡和森（1895.3—1931.8）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公认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党史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视其为重点的研究对象，作过较深入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作为传记性质而又内容丰富的专著极少，中共湖南双峰县委罗绍志等人撰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蔡和森传》是一本较全面评述蔡和森一生、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蔡和森研究较高水平的著作，读罢，受益匪浅。该书迄今仍然是研究蔡和森的必读书目之一。然而，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该书在资料取舍、研究视角和范式的选定等方面都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湘潭大学李永春教授著的《蔡和森思想研究》，2011年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目前所见“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蔡和森思想的专著”，^①值得一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林家品创作的《蔡和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出版。该书虽为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的传记，可读性强，但主要体现的是红色历史小说性质。加之，与蔡和森同时代而又差不多同样在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都绝不会只有极少版本的传记留传于世，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国焘等就有几本传记传世。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传记有更多的版本，则自在情理之中，另当别论。时代在不断地发展，新的史料在不断地发掘，学术研究亦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蔡和森的研究亦不例外。思虑至此，我更加坚定了撰写一本新的蔡和森传的意念，希望以新的史料、以新的视角和以更忠实于历史的治学态度，写出一本真实的蔡和森传，并希望叙事论史的基础上，凸显对蔡和森在各个时期言行的评论特色，故而取名《蔡和森评传》。

^① 张玉菡：《〈蔡和森思想研究〉评介》，《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56页。

蔡和森原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上小学时取名“和森”，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开始沿用“蔡林”双姓，取学名叫蔡林彬。1922年从法国归国参加党中央的工作后，停用“蔡林彬”这个名字，而再用“和森”之名。他还有“H·S”（系取“和森”二字的英文拼音字头）、“WAT·SON”（即“和森”的英文署名）、与妻子向警予共同使用的“振宇”笔名。1931年在香港被捕时化名为“胡世辉”。^①

蔡和森出生和生活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重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在守旧与趋新的激烈冲撞历程中，“社会转型”的特点日渐凸显的时代。这些宏阔的社会背景和强烈的时代特点，对正处于成长中的蔡和森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19世纪中叶以来，湖南省先后涌现了一些极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就有曾国藩、谭嗣同和杨昌济等人。蔡和森的成长，曾受到以他们为代表的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在给毛泽东等人的信中说：“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曾国藩）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蔡和森的一位在河北布里村的同事回忆说：“和森早期思想受近代人影响最大者为湖南浏阳谭嗣同”。

蔡和森在青少年时期就忧国忧民，志向高远。在母亲的支持下，他赴长沙求学，进而与毛泽东等创建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在陈独秀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感召下，他前往北京，途经洞庭湖时吟出了“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豪言壮语。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和向警予等有志青年，漂洋过海，开启了浪漫又艰辛的法兰西之旅，留下了令人神往的“向蔡同盟”红色经典传奇。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之一。旅法期间，他“猛看猛译”马列著作，迅速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将学习心得和思考主张及时与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交流，凝聚共识。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首次在党内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命题，意义深远。

蔡和森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他在党的“二大”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发表了134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指导中国国民革命。他撰写的《社会进化史》，重点宣传了唯物史观。他写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等，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中共党史研究史料。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他参与领导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系列维权斗争，使其迅速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与李立三、刘少奇等共同领导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八七会议上，他和瞿秋白、任弼时等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是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核心决策层的成员。

蔡和森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战斗在革命的第一线。1931年8月，他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

抚今思昔，蔡和森等共产党人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5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蔡和森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在会上强调指出：“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热潮中，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蔡和森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缅怀蔡和森同志光辉的一生，学习和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①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迫切^②。毫无疑问，蔡和森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源泉之一。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春季开学典礼上更是强调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只有“大兴学习之风”，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③因此，出版《蔡和森评传》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

① 《光明日报》2005年3月31日第1版。

②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0日第1版。

③ 《党建》2013年第3期。

第一章

动荡的青少年(1895.3—1913.2)

一 诞生在上海

1895年3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一个小男孩诞生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今江南造船厂)的一个小官员家里。他,就是本书的传主——蔡和森。

过去,人们都以为蔡和森祖辈世居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该镇现改为双峰县),始祖姓蔡。此观点以罗绍志等撰写的《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本书以下均简称罗绍志《蔡和森传》)和王继平等撰写的《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为代表。其实不然。据有的学者考证,蔡和森的九世祖并非姓蔡,而是姓林,名叫林舒国,是清朝的探花,任翰林学士,世居福建省莆田县。可见,说蔡和森祖籍湖南湘乡县不准确。林舒国的舅父蔡开臣出身于当地望族,但遗憾的是婚后无子嗣。依照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伦理观念,林蔡两家协议,林家将其子过继给了蔡家。公元1671年(康熙十年),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准备响应吴三桂反叛清廷。林舒国可能为避战乱之祸,从福建迁居湖南,从此改姓为双姓“蔡林”,^①有时也用单姓。

迁入湖南省境内的蔡林氏家族居住在湘乡县永丰镇人寿总季家巷。由于永丰地处山区,盛产的辣椒质量很好。蔡林氏家族遂开设了一家蔡广益酱园,并兼营南方市场的货物。因为蔡林氏祖传制酱的技术精湛,所以,他们生产的辣酱畅销全国,获利丰厚。蔡和森的祖父蔡寿崧,有

^① 韩泰华:《关于蔡和森研究的若干问题》,《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0期。

意科举仕途发展，但在名落孙山后只好弃学从商。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鼎盛时期的蔡家，除开店经商外，还有六十亩地”，^①生活颇为富裕。1853年初，正在家乡为去世的母亲守孝的京官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兴办湘军，以对抗太平军。受此影响，蔡寿崧弃商从戎，投入到湘军行列，并当上了一名哨长。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朝廷下令裁减湘军，蔡寿崧被遣散回乡。从此在家闲居，不再外出。

蔡和森的父亲蔡蓉峰（1862—1932年），从小不会读书，长大又不善经商，长年在家，无所作为。但他能把握有利于他的机遇。1894年（光绪二十年），在他32岁时，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槩当上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总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曾国藩、李鸿章两位晚清“中兴名臣”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本着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双重目的，于1865年联手兴办起来的。由于曾国藩首创的湘军东征西讨，为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捻军反清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清王朝对曾国藩和湘军重要将领奖赏有加，以致各省督抚和其他要缺官职为湘系将领所占有的不少。聂缉槩出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总办一职，大概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聂缉槩后来又署理江苏巡抚等职，并投资于纺织行业，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之一。对于同是湖南人的聂缉槩出任总办一事，蔡蓉峰喜出望外。他充分利用他父亲参加过湘军和自己岳母是曾国藩侄女的关系，千里迢迢从湖南投奔到上海。毕竟是乡谊亲情发挥了关键作用，聂总办同意给蔡蓉峰安排一个职位。经他举荐，蔡蓉峰得到了清廷诰授“奉政大夫，州同衔，补用从九”的官衔。^②从此，局里的同乡都尊称他为蓉峰大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的一个重大工程，对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发挥了先锋作用。但其人事管理制度等方面又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关系色彩。这从蔡蓉峰的成功谋职一事中可见一斑。

蔡和森的母亲葛兰英（1865—1943年，后改名葛健豪，一个非常

^① 中共双峰县委：《蔡和森烈士在故乡》，见《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本书以下简称《怀念蔡和森同志》）。

^② 见《湘乡永丰蔡林氏家谱》。

男性化的名字)，虽出身于湘乡荷叶（今双峰县攸永乡）望族，但并没有那种“大家闺秀”的骄娇之气。相反，她衣着朴素，勤俭持家，厚道贤淑，在邻里间口碑颇好。在生下蔡和森之前，她已先后生下了长子蔡磨仙（1885—1907年）、次子蔡麓仙（1889—1925年），长女蔡庆熙（1884—1957年）和次女蔡顺熙（1893—1904年）4个孩子。蔡和森是她疼爱的第五个孩子。

蔡和森出生和生活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重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在守旧与趋新的激烈冲撞历程中，“社会转型”的特点日渐凸显的时代。这些宏阔的社会背景和强烈的时代特点，对正处于成长中的蔡和森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最早对蔡和森成长产生影响的当然要数他的家庭和他父亲供职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局里的管理人员绝大部分并不是通过考试或公开招聘录用的，而是来自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他们文化知识不多，更缺乏近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在这个官办性质的企业里，一方面总办、会办、襄办和提调之类的官吏，高俸厚禄，养尊处优，生活奢华；另一方面，处在生产劳动一线的广大工匠工人，却日夜在“巡警营”的刀枪和棍棒下紧张地劳作，收入微薄，又无人身自由。工人累垮病倒，或被认为“手艺低下”，不是以“旷工”之名被开除，就是以其他各种借口被裁减。有许多工人被迫离开局厂之后，无依无靠，流落街头。^①这种管理与被管理所体现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家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当时的上海和整个中国城镇特别是通商口岸所具有的普遍现象。毫无疑问，这种现象深刻地反映了紧张的阶级对立的关系，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蔡蓉峰的一家。

蔡蓉峰在总局的官衔是“奉政大夫”。官职虽然不大，但毕竟也是局里的所谓的“管理者”，属于剥削者。他来上海之前就有些不务正业。在到上海这个近代化的大都市的十多年时间里，正经的没学多少，相反却沾染上了严重的官僚恶习。他学会了吸食鸦片，处处摆出一副大官僚的架子，在家里更是神气十足。当时，葛兰英作为家庭主妇，没有外出干活谋生，全家七口人的生活保障都依赖于蔡蓉峰一

^① 罗绍志等：《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人。从家庭的视角看，他有功于蔡和森全家。然而，蔡蓉峰为人较为刻薄，缺乏同情心，这与他妻子葛兰英的宽厚和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同情工人，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棚户区”的工人同乡家里串门，有时还送点钱接济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母亲的言行，对孩子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后来，蔡麓仙、蔡和森兄弟俩走上为穷苦人而奋斗的革命道路，其母亲同情贫苦人家的善良宽厚的品德，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葛兰英平日不满丈夫的行为，有时耐心诚恳地规劝他，希望他“宽恕待人”，“厚德载福”，但他不以为然，仍然坚持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夫妻间的距离逐渐拉大，终于导致了一场家庭风暴，夫妻分居，蔡和森在上海4年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寒气逼人的早晨。一位瘦骨嶙峋的中年工人来到蔡家，恳求蔡蓉峰念在同乡的情分上，到局里替他求情，不要因为他有点疾病就裁减他。蔡蓉峰忘记了十多年以前他也是通过关系在局里谋到职位的。现在有乡亲有求于他，他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把他训斥了一顿，赶出门去。在一旁目睹丈夫行为的葛兰英十分伤心和气愤，她拿出自己积攒的几块钱牵着和森，默默地走到门外，把钱塞到了那个工人的手里。没料到，妻子的善行大大地触犯了蔡蓉峰的尊严，他顿时大怒起来，冲着母子俩骂道：“你们娘崽都是老子养活的，吃现成饭不要紧，还要拿老子的钱送人情！”他一边骂一边抡起旱烟袋朝妻子打过去。葛兰英一手挡开旱烟袋，一手紧护着和森，大声回敬丈夫说：“你自己想想，你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了？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你对同乡的困境不同情，还要把人家赶出门去。你对穷人如此横蛮，对局里的洋大人却那样恭顺，难道你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葛兰英借此机会将平日里压在肚子里的闷气全倒了出来。这些话字字句句像针一样扎在了蔡蓉峰的痛处。他更加暴怒了，连连拍着桌子吼道：“你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

听到蔡蓉峰叫他们“滚”，葛兰英反倒冷静下来。她回想这些年来跟随丈夫在上海所受的委屈，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愤懑，冷冷地说：“我早知道你会赶走我们母子的。说实在的，你这样不务正业，我早就看不惯了。但为了几个孩子，我才一直忍气吞声，规劝你，等待你，希望你改邪归正。现在看来，这一切完全没有指望了。”

蔡蓉峰夫妇的这场冲突和争吵，加剧了他们的感情危机。没过多久，意志坚强的葛兰英终于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丈夫，带着蔡和森姐弟回到了家乡——永丰镇。

二 寄居于外祖母家

刚满4岁的蔡和森跟随母亲回到永丰镇不久，他们又来到了距离永丰镇70华里的荷叶塘，寄居在外祖母家。

荷叶塘是一个偏僻的山乡，位于湘乡、湘潭和衡山县交界处，四面环山，中间地势低洼，像一片荷叶，悠悠涓水流贯其中，故名荷叶塘。19世纪中叶以来，湖南省湘乡县先后涌现了一些极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就有曾国藩。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的成长，曾受到曾国藩多方面的深刻影响。首先是血缘和地域关系对少年蔡和森成长的影响，其次是亲师关系和湖湘文化对青年蔡和森成长的影响。这里先分析一下血缘和地域关系对少年蔡和森的影响。

曾国藩的出现和湘军的崛起，无疑使“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①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令朝野震惊，为后世楷模。湖南人常常因为出了个曾国藩而骄傲，湘乡人则更引以为自豪。作为曾国藩的同乡、远亲和后辈，蔡和森在当时也不可能超脱中国民间以乡邻出显贵而倍感荣耀的世俗风气的影响。

曾国藩是湘乡荷叶塘人，蔡和森是湘乡永丰镇人，两地相距70华里。在荷叶塘，居住着三姓大户人家：一是曾家，二是王家，三是葛家。曾家自是不提，权势至极，王葛两家也在朝廷做过大官。三家除广置田产外，还在当地营建了9座富丽堂皇的庄园，并且彼此联姻，官官相护，构建了当地封建官僚地主宗族统治的权势格局。一般的中小地主之家均欲示好于这三大人家。

从蔡和森祖父蔡寿崧在世时就开店经商，又置有60亩土地的财产状况来看，他家的成分大概应被划为地主。蔡家与曾家、葛家不仅有同乡关系，而且还存在联姻关系。据曾、葛两家族谱记载，曾国藩的第六